

笔记留白处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我们孙辈的

经济前景》

(1930

年) * I

眼下，我们正饱受经济悲观主义的严重侵袭。人们常说，标志着十九世纪的巨大经济进步时代已经结束；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现在将放缓——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在我们面前的这十年里，繁荣衰退的可能性要大于改善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是对当前局势的一种严重误读。我们所承受的，并非老年的风湿之苦，而是过快变革带来的成长阵痛，是经济时期更替过程中调整所带来的痛苦。技术效率的提升速度超过了我们解决劳动力吸纳问题的能力；生活水平的提高略显过快；全球的银行和货币体系则阻碍了利率以均衡所要求的速度下降。即便如此，由此产生的浪费和混乱所涉及的金额也不过占国民收入的7.5%；我们每1英镑中就白白浪费了1先令6便士，只剩下18先令6便士，而如果我们更明智些，本可以拥有1英镑；然而，这18先令6便士的总和，却相当于五六年前1英镑的价值。我们忘记了，1929年英国工业的实物产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在支付所有进口费用后，可用于新海外投资的国际收支净盈余，去年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高，实际上比美国的相应盈余高出50%。或者——如果非要进行比较的话——假设我们将工资削减一半，拒绝偿还五分之四的国家债务，并将我们的剩余财富囤积在毫无用处的黄金中，而不是以6%或更高的利率出借，那么我们会变得像如今备受羡慕的法国一样。但这真的算是一种进步吗？

当前席卷全球的经济萧条、在需求旺盛的世界中失业现象这一巨大反常，以及我们所犯下的灾难性错误，都使我们无法看清表象之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无法正确解读事态的发展趋势。因为我预言，当下在世上喧嚣不已的两种对立的悲观主义谬误，都将在我们这一代被证明是错误的——一种是革命者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局势已恶化到唯有暴力变革才能拯救我们；另一种是反动派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我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平衡如此岌岌可危，以至于我们绝不能冒险进行任何尝试。

然而，我撰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并非为了考察当下或近期未来，而是要摆脱短视的局限，展翅飞向未来。我们有理由期待一百年后的经济生活将达到何种水平？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拥有怎样的经济前景？

从我们有记载的最早时期——大约追溯到两千

凯恩斯论可能性

年——直至十八世纪初，生活在地球文明中心地区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当然会有起起落落。瘟疫、饥荒和战争的侵袭。黄金时期。但没有渐进式的剧变。在（假设）以公元1700年为终点的四千年间，某些时期的生活水平或许比其他时期高出百分之几——至多高出百分之100。

这种缓慢的进步速度，或者说缺乏进步，归因于两个原因——重要技术改进的显著缺失，以及资本积累的失败。

从史前时代到相对近代，重要技术发明的缺失确实令人惊叹。几乎所有真正重要且在近代初期世界已拥有的事物，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就已经为人所知。语言、火、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那些家畜、小麦、大麦、葡萄和橄榄、犁、车轮、船桨、船帆、皮革、亚麻和布料、砖和陶器、金、银、铜、锡和铅——以及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加入该名单的铁——还有银行业、治国之道、数学、天文学和宗教。关于我们何时首次拥有这些事物，并无记载。

在史前某个时期——也许甚至是在上一次冰河时代之前某个气候宜人的间歇期——必定曾有一个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相媲美的进步与发明时代。但在有记载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却没有任何此类迹象。

我认为，现代时代的开启始于十六世纪开始的资本积累。我坚信——出于某些在此不便赘述的理由——这最初源于物价的上涨及其带来的利润，而物价上涨又源于西班牙从新大陆运回旧大陆的金银宝藏。从那时起直至今日，复利所产生的积累力量——这种力量似乎已沉睡了许多代人——得以重生并焕发新生。而复利在两百余年间所展现的威力，其之大，简直超乎想象。

为说明这一点，请允许我举一个我计算出的数字。据估计，英国目前海外投资的价值约为

4,000,000,000英镑。这为我们带来了约6.5%的收益率。其中一半我们带回国内享用；另一半，即3.25%，则留在外地以复利形式积累。类似的情况至今已持续了约250年。

因为我认为，英国海外投资的起源可追溯至1580年德雷克从西班牙掠夺的财宝。那一年，他乘“金羚号”返抵英格兰，带来了惊人的战利品。伊丽莎白女王是资助此次远征的财团中的一位重要股东。她用自己那份收益清偿了英格兰全部的外债，平衡了国家预算，手头还剩下约40,000英镑。她将这笔钱投资于黎凡特公司——该公司经营兴旺。凭借黎凡特公司的利润，东印度公司应运而生；而这家伟大企业的利润，则成为英国后续海外投资的基石。巧合的是，40,000英镑按3‰的复利累积，其数额大致相当于英国在不同时期的实际海外投资总量，若按今日价值计算，将达到

4,000,000,000英镑，这正是我此前引用的我国当前海外

投资总额。由此可见，德雷克于1580年带回的每一英镑，如今已增值至100,000英镑。这就是复利的力量！

从十六世纪开始，随着十八世纪后势头日益增强，科学技术发明的大时代拉开了序幕，自十九世纪初以来，这一浪潮便一发不可收拾——煤炭、蒸汽、电力、汽油、钢铁、橡胶、棉花、化学工业、自动机械与大规模生产方式、无线电、印刷术，以及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还有成千上万其他因过于著名和耳熟能详而无法一一列举的事物与人物。

结果如何？尽管世界人口大幅增长——必须为这些人口提供住房和机器——但我认为，欧美地区的人均生活水平已提高了约四倍。资本的增长规模，远超以往任何时代所知的一百倍。而且从现在起，我们不必再预期人口会有如此巨大的增长。

如果资本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那么二十年后，全球的资本设备将增加一半，一百年后将增加七点五倍。试着从物质层面来思考这一点——住房、交通工具等等。

与此同时，过去十年间，制造业和交通运输领域的技术进步速度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美国，1925年的人均工厂产量比1919年高出40%。在欧洲，虽然我们受到暂时性障碍的制约，但即便如此，也可以肯定地说，技术效率正以每年超过1%的复合增长率提升。有迹象表明，迄今主要影响工业领域的革命性技术变革，可能很快将波及农业。我们或许正处于粮食生产效率提升的临界点，其幅度将不亚于采矿、制造业和交通运输领域已实现的进步。在数年之内——我的意思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或许能够仅凭过去所需人力四分之一，就完成农业、采矿和制造业的所有作业。

眼下，这些变化的迅猛速度正在给我们带来伤害，并带来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那些未能站在进步最前沿的国家，正承受着相对更大的痛苦。我们正遭受一种新病症的困扰，有些读者或许尚未听说过它的名字，但在未来几年里将会频繁听到——即“技术性失业”。这意味着，由于我们发现的节省劳动力手段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我们为劳动力寻找新用途的速度，从而导致了失业。

但这仅仅是暂时的不适应阶段。从长远来看，这一切都意味着人类正在解决其经济问题。我预测，一百年后，进步国家的生活水平将比今天高出四到八倍。即使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来看，这也不足为奇。设想可能取得远超此水平的进步，也并非异想天开。

II

让我们姑且假设，一百年后，我们所有人平均而言，在经济上的生活水平都比

凯恩斯论可能性

。这无疑理所当然的，不足为奇。

诚然，人类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但这些需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的需求，即无论周围人的处境如何，我们都会感受到这种需求；另一类是相对的需求，即只有当满足这些需求能使我们凌驾于他人之上、让我们感到优于他人时，我们才会感受到这种需求。第二类需求，即满足优越感的需求，确实可能永无止境；因为总体水平越高，这类需求就越高。但绝对需求则不然——很快就会达到一个临界点，或许比我们所有人意识到的都要早得多，届时这些需求将得到满足，具体表现为：我们更愿意将余下的精力投入到非经济目的上。

现在我来阐述我的结论，我想，你们越是深入思考，就会越发觉得它对想象力的冲击力越来越大。

我得出的结论是：假设没有重大的战争，人口也没有显著增长，*经济问题*可能在百年之内得到解决，或者至少能看到解决的曙光。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非人类的永久性难题*。

你们可能会问，这为什么如此令人震惊？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展望未来，而是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经济问题，即生存斗争，迄今为止一直都是人类的首要、最紧迫的问题——不仅是人类，更是从生命以最原始形式出现之初起，整个生物界的首要问题。

因此，大自然正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才将我们——连同我们的一切冲动和最深层的本能——明确地演化出来的。如果经济问题得到了解决，人类将失去其传统的生存目的。

这会是一种福祉吗？如果人们真的相信生命的真实价值，那么这一前景至少为福祉打开了可能性的大门。然而，一想到普通人那些历经无数代传承下来的习惯和本能——而他可能被要求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将其抛弃——我便感到不寒而栗。

用当今的术语来说——我们难道不该预见到一场普遍的“精神崩溃”吗？我们已经对我的意思略有体会——那种在英美两国富裕阶层妻子中已相当普遍的神经崩溃。这些不幸的女性，其中许多人因财富而失去了传统的职责和消遣——当失去经济迫切性的驱使后，她们觉得做饭、打扫和缝补不再足够有趣，却又完全找不到更有趣的事情。

对于那些为生计而辛劳的人来说，闲暇是令人向往的甜蜜——直到他们真正拥有它为止。

有一位年迈的女佣曾为自己写下这样一则传统的墓志铭：——

朋友们，别为我哀悼，永远别为我流泪，因为我将永远
、永远什么都不做了。

这就是她的天堂。和那些憧憬闲暇的人一样，她想象着静静聆听时光流逝是多么美妙——因为她的诗中还有另一句对联：

天国将回荡着赞美诗与美妙的音乐，但我与歌唱毫无瓜葛。

然而，只有那些参与歌唱的人，生活才算得上尚可忍受，而我们当中又能有多少人会唱歌呢！

因此，自人类诞生以来，将首次面临一个真实而持久的问题——如何利用摆脱了紧迫经济忧虑的自由，如何充实科学与复利为他赢得的闲暇，从而过上明智、愉快且美好的生活。

那些奋力拼搏、目标明确的赚钱者或许会带着我们所有人一起步入经济富足的怀抱。但唯有那些能够延续并进一步完善生活艺术本身、而不为谋生手段而出卖自己的人，才能在富足来临时真正享受它。

然而，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不怀恐惧地期待闲暇与富足的时代。因为我们长期以来被训练成只知奋斗，却不知享受。对于那些没有特殊才能的普通人来说，如何充实自己是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尤其是当他们不再扎根于土地、习俗，或是传统社会中那些深受喜爱的惯例之时。从当今世界任何地方富裕阶层的行为和成就来看，前景确实令人沮丧！因为他们可以说是我们的先遣队——那些为我们其他人探查“应许之地”并在那里安营扎寨的人。在我看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那些拥有独立收入却缺乏社交关系、责任或羁绊的人——在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时，都遭遇了惨痛的失败。

我确信，只要积累更多经验，我们利用大自然新发现的馈赠的方式，将与当今富人截然不同，并会为自己规划出一套与他们迥然相异的生活蓝图。

在未来的许多个世纪里，“旧亚当”在我们体内仍将如此强大，以至于每个人若感到满足，就必须做些工作。我们将为自己做更多事情，这与当今富人惯常的做法不同——他们往往只乐于承担些微不足道的小职责、任务和例行公事。但除此之外，我们将努力“薄涂黄油”——让尚待完成的工作尽可能广泛地分摊。三小时轮班制或每周工作十五小时，或许能将这个问题推迟很长时间。毕竟，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每天工作三小时就足以满足体内的“旧亚当”了！

其他领域也必将发生我们所预期的变化。当财富积累不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时，道德准则将发生巨大变革。我们将能够摆脱两百年来一直困扰我们的许多伪道德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人类某些最令人反感的品质被奉为最高美德。我们将有能力、也有勇气去客观评估金钱动机的真实价值。将金钱视为一种占有——

有别于将金钱视为享受生活和追求现实的手段——这种对金钱的热爱将被认清其本质，即一种略带

令人作呕的病态倾向，属于那种半犯罪、半病理的倾向，人们会战战兢兢地将其交给精神疾病专家处理。各种影响财富分配以及经济奖惩的社会习俗和经济惯例，尽管它们本身可能令人反感且不公平，但正因它们在促进资本积累方面极具效用，我们如今才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维系；届时，我们将终于能够自由地摒弃它们。

当然，仍会有许多人怀揣着强烈而未得到满足的“目的性”，盲目地追求财富——除非他们能找到某种看似合理的替代品。但我们其余的人将不再有任何义务去为他们喝彩或鼓励他们。因为我们将以比今天更深入（甚至到了不安全的地步）的视角，探究这种“目的性”的真实本质——大自然在不同程度上赋予了我们几乎所有人这种特质。因为目的性意味着，我们更关注自己行为在遥远未来的结果，而非行为本身的品质或其对我们自身环境的直接影响。“有目的性”的人总是试图将对行为的关注推向未来，从而为其行为谋求一种虚假且虚幻的不朽。他爱的不是自己的猫，而是猫生的小猫；说实话，他爱的也不是小猫，而是小猫生的小猫，如此往复，一直延续到猫族灭绝的那一天。对他而言，果酱只有在“明天有果酱，今天没有”的情况下才算果酱。因此，通过将果酱永远推向未来，他力图为自己煮果酱这一行为争取永生。

请允许我提醒你《西尔维与布鲁诺》中的那位教授：

“先生，只是裁缝先生，带来了您的一张小账单，”门外传来一个温顺的声音。

“啊，好吧，我很快就能办妥他的事，”教授对孩子们说，“只要你们等一分钟。今年要多少钱，老兄？”他正说着，裁缝已经进来了。

“呃，你看，这笔钱已经翻倍好多年了，”裁缝略带不耐烦地回答道，“我想现在就收这笔钱。是两千英镑！”

“哦，那算什么！”教授漫不经心地说道，一边摸着口袋，仿佛他身上总是至少带着这么多钱似的。“不过，你不想再等一年，让它变成四千吗？想想看，你会有多有钱！哎，如果你愿意的话，说不定还能当上国王呢！”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当国王，”那人若有所思地说，“但这笔钱听起来确实多得惊人！好吧，我想我会等一等——”

“那当然要等了！”教授说道，“我看你还挺有头脑的。再见啦，老兄！”

“你以后真的得付给他那四千英镑吗？”随着债主离去，门关上的瞬间，西尔维问道。

“永远不用，孩子！”教授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会一直把数目翻倍，直到他死去。你看，为了得到双倍的钱，多等一年总是值得的！”

或许并非偶然，那个最致力于将永生之承诺融入我们宗教核心与精髓的民族，同时也为复利原则做出了最大贡献，并特别钟爱这一人类制度中最富目的性的产物。

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自由地回归宗教与传统美德中那些最可靠、最确凿的原则——贪婪是一种恶习，收取高利贷是一种轻罪，贪恋金钱是可憎的；那些最不为

凯恩斯论可能性

明日之事的人，才是真正走在美德与理性智慧道路上的人。我们将再次将目的置于手段之上，将善置于实用之上。我们将尊崇那些能教导我们如何以美德和善意把握当下的时刻与日子的人，那些能够直接从事物中获得愉悦的可爱之人，那些既不劳作也不纺线、如田野中的百合花般的人。

但请当心！这一切的时机尚未成熟。至少在未来一百年里，我们必须对自己和所有人假装“美即是丑，丑即是美”；因为丑是有用的，而美则不然。贪婪、高利贷和谨慎还必须再作为我们的神明存在一段时间。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将我们从经济迫切需求的隧道中引向光明。

因此，我期待在并不遥远的将来，人类整体的生活物质环境将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但当然，这一切将循序渐进地发生，而非以灾难的形式降临。事实上，这一变革已经开始了。事态的发展轨迹将仅仅是：越来越多的阶层和群体将实际上摆脱经济迫切性的困扰。当这种状况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对邻人的义务性质发生改变时，这一关键性的转变便会显现。因为即使对自身而言，经济上的目的性不再合理，但为他人保持这种目的性仍将是合理的。

我们抵达经济极乐之境的速度将取决于四点：我们控制人口的能力、我们避免战争和内乱的决心、我们愿意将本应由科学负责的事务交由科学来指导的意愿，以及由我们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额所决定的积累速度；只要前三个条件具备，最后一点自然会迎刃而解。

与此同时，为我们的命运做些适度的准备，鼓励并探索生活艺术以及有目的的活动，也无妨。

但最重要的是，切勿高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也不要为了其所谓的必要性而牺牲其他更为重要且更具持久意义的事务。这应当是专家们的事——就像牙科一样。如果经济学家们能设法让自己被视为谦逊、称职的人，与牙医处于同等地位，那将再好不过了！

* 扫描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服随笔》，纽约：W.W.诺顿公司，1963年，第358-373页。